

王克文，《汪精衛·國民黨·南京政權》
民國史學叢書 14。臺北：國史館印行，2001。421 頁。

汪榮祖*

有不少作者很在意書名，有的甚至挖空心思，極盡巧思而後已；然而書名至少要符合內容，庶免「文不對題」的困窘。初看這本書的題目，還以為是論述「汪精衛」、「國民黨」、「南京政權」三個對等的議題，展卷之後，才知道從頭到尾談的是汪精衛，從汪之「不負少年頭」，到「最後之心情」。然而又不是一本研究汪精衛一生的完整之作，因為僅僅是作者單篇論文的合集，以致於一方面不夠詳盡，另一方面又時而重複。全書根本上是平鋪直敘的政治史論述，無多新意。王克文自研究所時期即開始研究汪精衛，至今已歷經二十寒暑，理當將多年的研究成果融會貫通，寫一本如雷聲般響亮的巨著，而不是好像只下一點毛毛雨。

汪精衛在海峽兩岸都早已蓋棺論定為漢奸，長久以來只見口誅筆伐，難以從事平心靜氣的客觀研究。一般讀者因而無從看到汪精衛的真相，對於所謂和平運動，更是諱莫如深。不過，自曾經參與汪政權的金雄白（朱子家）出版五卷本《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》（香港：春秋雜誌社，1959-1960）之後，在相當程度上揭開了汪政權的神秘面紗。金氏以相當坦誠的胸懷寫作，而其文采佳妙，更增加其可讀性，不僅流傳坊間，而且樂為學者們所引用，王克文也不例外。早在 1970 年代，即有兩位美國學者 John Hunter Boyle 與 Gerald

* 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

Bunker 出了專書；他們不受國內意識形態與政治情緒的干擾，開啓了客觀研究汪精衛的新頁。1980 年代以來，檔案文獻的大量出現，更爲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。大陸學者雖難擺脫所謂正確的政治觀點，仍然要儘量貶低汪精衛，然而在檔案文獻的基礎上論述，時有可喜的新發現。因此，這本論文集很難說是「嚴肅冷靜的學術研究」的「一個起步」（頁 1），「起步」已有一段時間了。王克文雖然對已經起步的學術研究有若干增補糾謬之功，並無重要的創獲，反而有些頗值得商榷的地方。至於王克文聲稱得睹的高宗武《身入虎穴》原稿，解答和平運動的「眾多疑點」（頁 266）；事實上，解答疑點無多，我們所知「和運」的來龍去脈，大致仍不出金雄白所述。

汪精衛於辛亥革命前，以謀刺攝政王繫獄而聞名，那首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五言絕句，更是傳誦一時。王克文似有意爲汪氏的「英雄形象」與「烈士情結」作些心理分析，用意甚佳，可惜並沒有借助「心解學」(psycho-analysis)方面的知識，但憑臆測，以致於只能有這樣的結論：「謀刺不成，繫獄未死，在汪氏心中也留下一絲遺憾」，此一遺憾使他「有愧於眾多被他詩詞所感動的崇拜者，這使他悵然若失」，甚至說「在潛意識裡，他似乎總嚮往著再得到一次爲國犧牲的機會」（頁 19-21）。刻劃心中的遺憾以及悵然若失的神情，需要充分的實據與深入的分析，不能引幾句話就可下定論。汪氏詩句如「頭顱看自厭，髀肉嘆重生」，自嘆繫於獄中不能與同志共同打拚，並無幸而不死的遺憾；「馬革能酬愧不如」，所謂自嘆不如這些同志馬革裹屍，乃禮讚廣州起義死難者的爲國捐軀，未必針對自己幸而不死而致憾。至於三十年後，回想舊事，感到「深以不獲早死爲恨」，則歷經滄桑之餘，心情更加複雜，更難以論斷爲「烈士情結」。類此繪聲繪影的心理描述，即使出之於小說家之筆，也是敗筆，因爲烈士情節要能「勇者不懼」，並不是非死不可；幸而不死，再接再厲，有何遺憾之可言？汪氏詩詞之所以感人，因頗具從容赴死、義無反顧的情懷，崇拜者豈會因其未死而致憾，使他有愧？再者，若果真如此自愧，如此遺憾，則有何

英雄形象之足言？然則，所謂難分的「英雄」與「烈士」之間，豈非又產生了「矛盾」？

詩言志，很可透露詩人的心聲，汪精衛不僅詩才高超，而且多愁善感，所撰《雙照樓詩詞》，無疑是探討他早年、中年、晚年的寶藏。可惜王克文未能多加利用，藉此深入分析汪氏的心境，以致於連獄中詩都要轉引自張江裁編的《蒙難實錄》。王克文不直接引用原文，而假手間接文獻之弊，尚不僅於此，如引章太炎對汪精衛的評語（頁 28），就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。

關於汪精衛在辛亥年不贊成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一事，實與「忠誠」無關，胡漢民也不贊成孫去南京，所謂「忠誠的反對」(loyal opposition)，未嘗不是出自善意。孫堅持就任，汪「只得順從」，並為孫起草就職宣言，也在情理之中；然則，又說汪的動機是不「能放過執筆這篇歷史性文獻的難得機會」（頁 27）。起草宣言的動機到底是為了「順從」呢？還是為了爭取「難得機會」的虛榮心？這又牽涉到汪氏性格的論定，從「漢奸」的先入之見論汪，必然是利欲薰心、戀棧權位等等。王克文雖強調汪之浪漫性格、烈士情結，凸顯理想主義的一面，但是對於汪氏戀棧與追求名利，又多所著墨，未求調和，以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，以致於時而出現「跳火坑」的浪漫，與熱衷權位的矛盾論述。若謂促成汪氏「和平運動」的「政治困境」，乃是由於西安事變之後，與蔣爭權無望之故（頁 260）。然則，汪氏此舉全是赤裸裸的權力考量，何來「浪漫」、「理想」與「跳火坑」？似乎又回到因與蔣爭權而投敵的舊說。

汪精衛作為一個政治人物，當然有權力的考量；只是長久以來將汪定性為「漢奸」，則其人無處不是權謀，追求名利，以致於賣國求榮。今欲作客觀研究，正須去掉有色眼鏡，作實事求是的觀察，以汪氏的「理想面」來平衡其「現實面」，至少不能把他的好處說成壞處。寧漢合流後，汪氏反對「特別委員會」，無非是堅持武漢政權為國民黨正統的原則，此一原則合乎歷史事實，並非汪氏個人的「認為」（頁 110），更不能說「對於自己的領袖地

位過於堅持」（頁 117）。蔣氏召開三全大會的用意，顯然要突出南京政權的正統性，汪氏的所謂「護黨運動」，也可說是維護原則。從這一段歷史看，他若不講原則，也許更能穩固他的領袖地位。書中所謂「中共對汪氏以怨報德」，實在大有語病，「容共」說不上什麼「德」，「分共」畢竟是「怨」。而論及汪、蔣關係，王克文也仍不免以蔣詘汪，例如中山艦事件，明明是（不是「似乎」）蔣以下犯上的奪權行爲。從蔣氏沒有刪減的日記，也可看出汪氏因怒而出走，更因俄國人左袒蔣氏，遂拂袖而去，說汪「被蔣氏逐出廣州」（頁 126、131），也有語病。再者，王克文用詞遣句，一再出現「汪氏及其黨羽」云云，須知「黨羽」一詞，乃指惡勢力集團及其附從者；王克文此舉又不免陷入主觀的道德裁判矣。

王克文對汪精衛於抗戰爆發前處理中日關係，特別注意其「一面抵抗，一面交涉」的政策。關於此一政策，許育銘在其《汪兆銘與國民政府》（臺北：國史館印行，1999）一書中，有更詳細的論述。不過，王克文特別強調抵抗與交涉之間的相互關係，也就是說，汪氏認為「唯有一面抵抗，才能爲一面交涉製造形勢增加籌碼，所以兩者相須（需？）而行，缺一不可」（頁 191）。王克文更指出，汪氏於抗戰爆發後認為，既抵抗了，爲交涉提供了契機。換言之，汪氏於抗戰後推行「和運」，仍是一本「一面交涉，一面抵抗」的政策。王克文沒有指出的是，在兩國實力差距太大的情況下，這根本是行不通的政策，難道抵抗不住或抵抗失敗會增加交涉的籌碼嗎？恐怕只會失去更多的籌碼吧。另外，將不抵抗歸罪於地方軍閥，也不公平；「不抵抗」乃是在中央的蔣介石的既定政策。王克文著墨於汪精衛與張學良的衝突，而不去追究汪、蔣合作期間在政策上的矛盾，未免掩蓋了一些實情，同時也因而未能深入探討汪氏作爲政治人物的嚴重缺失。有鑒於他一味追尋不切實際的「一面交涉，一面抵抗」政策，以及對西安事變錯誤的認知（見頁 248），汪精衛即使有良好的機會，恐怕亦未必是治世之能臣吧。

此外，必須指出，這本國史館印製的書，錯字之多，出人意表。書後的

勘誤表仍有太多的漏網之魚，如將「式微」誤作「勢微」（頁 183），把「高宗武」誤植為「高宗正」（頁 295）；最有趣的是，把唐德剛教授誤作「美籍華裔學者」（頁 265）。

這本論文集行文，敘述多於分析，大致通順可讀，但亦頗有可以改訂之處，文句如「汪氏這些言論，顯示清黨後他『反軍閥』的立場雖未改變，而其目標已悄悄從北洋軍閥轉為黨內的新『軍閥』」（頁 137），難稱清通，應改寫為「汪氏這些言論顯示，他『反軍閥』的立場於清黨後雖未改變，但針對的目標不再是北洋軍閥，而是黨內的新『軍閥』」。又如「面對一連串的軍事挫敗，他仍斷定中國的軍隊不如人」（頁 217），有點不知所云。按邏輯說，只能是「他面對一連串的軍事挫敗，仍斷定中國軍隊並非不如人」，或「他面對一連串的軍事挫敗，不得不斷定中國軍隊不如人」。筆者無意挑王克文文字上的小毛病，而是藉此機會與寫文章的朋友們互勉。